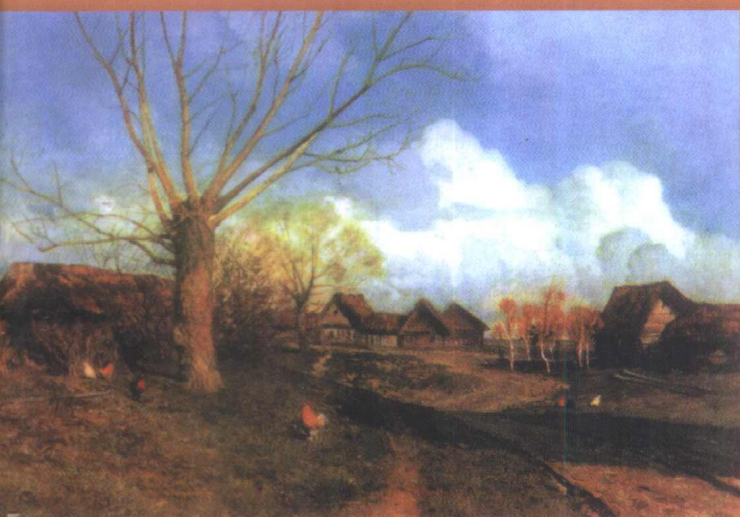


胡真译文集

HUZHENYIWENJI





胡真译文集

HUZHENYIWENJI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真译文集 / 胡真译. —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,
2001

I. 胡... II. 胡... III. 俄文—译文—文集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058308号

胡 真 译 文 集

胡 真 译

责任编辑: 周志平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韶山北路64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宏达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32开 印张: 5.5 字数: 136000

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

ISBN 7-5355-3529-1/G·3524

定价: 10.00元

本书若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我的译文集责任编辑周志平同志来送清样稿，建议我为译文集写个前言或后记。

写些什么呢？经再三考虑，还是写点我学习外文和做翻译工作的情况吧！

我从小就喜欢外文。一生中，学过英文、日文、俄文、法文、德文和世界语，学得有些成就的算是俄文。

我学习俄文，始于 1937 年。那时我在上海苏州河北岸志丰钢铁五金店当学徒，以读夜校的名义，到一位从东北回上海，家住新闸路的地下党员张同志处学习。当时条件很差，没有课本，由张同志口讲笔写，就这样学习了几个月，打下了一点基础。

到延安后，1939 年在马列学院业余俄文学习班学习，教师是师哲同志。延安成立中央研究院，我在研究院俄文研究室任研究员，继续在师哲同志指导下从事俄文研究工作。

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，我发表了第一篇译文《苏联妇女在卫国战争中》，后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译了《列宁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》一文，该文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之一；又应当时的中央职工委员会之邀翻译了《马克思与职工会》一书，约 30 万字。

在湖南，我从俄文翻译的书有：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小传》、《邓肯和叶赛宁的生死恋》（与人合译）、《朱可夫传》等。我的朋友——杨实和郭鐸权同志曾给过我帮助。杨实同志为我的

译文《元帅著书》仔细地做了两遍校阅；郭鐸权同志把我的一篇译文《一个难忘的冬天》推荐给广东花城出版社，在《译海》杂志上发表。在此，深表感谢！

中国翻译界有句名言，译文要做到“信、达、雅”。我在翻译时竭力争取做到。但自己能力有限，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，祈望方家指正。

胡 真

2001年7月22日

目 录

最后一颗子弹·····	1
苏联妇女在战斗中·····	26
没有装胶卷的暗匣·····	29
在泰加森林中·····	37
一个难忘的冬天·····	44
列宁住宅博物馆·····	53
我们坚信——列宁和我们在一起·····	59
列宁的形象·····	61
普列汉诺夫·····	67
元帅著书	
——回忆 Г. К. 朱可夫·····	76
列宁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·····	128
论党的工作者的眼界·····	134

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经典著作	
——论斯大林著《胜利冲昏了头脑》	137
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	145
美国的钢铁生产问题	152
关于高尔基的研究	
——纪念高尔基诞辰 120 周年	155

最后一颗子弹

[苏] 斯·巴鲁士廷

我们埋伏在布列斯拉到柏林去的公路主干线上。我们的同伴大部分都来自农村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漂亮的公路，他们毫不掩饰地羡慕起来：“魔鬼才有本事修筑这样的公路。”

在大反攻的日子里，经常会出现一些蠢事。现在发生的这件事，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在我们之前在公路上设防的部队，已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很显然，他们估计附近没有德国人。可是，德国人偏偏出现了。情况很清楚，大量的德国部队就布置在对面的建筑物里，他们似乎在集合，准备向公路主干线上开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命令我们在桥旁公路主干线设防。我们都是些不怎么地的战斗员——独立炮兵侦察营的地形测绘员、摄影师、测音员，偏偏遇到这样的情况。真是遗憾，我们剩下的人已很少——在 120 人中，被打死的差不多近 60 人。而剩下来的人，只有军官、炊事员、值班员、汽车司机。这样，用于埋伏在公路主干线上的，大约只有 40 人。

周围静悄悄的。德国人没有出来。只有在桥后边，响起了可疑的摩托车嘎嘎嘎的声音。这声音老是使我们不得安宁。

公路主干线的另一端，大约在 300 米的地方，有一片树林。我们留心地仔细观察，可是那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这样过去了一两个小时。春天的太阳晒得很厉害，甚至开始觉得有点燥热。小草已经渐渐地绿起来。

我们被晒得懒洋洋了。可是，摩托车的声音仍然使我们不得

安宁。

“可以去侦察一下吗？”我问自己旁边的谢列日·沙雷金。

“干嘛？必须要得到中尉的准许。”

我们由布尔科夫中尉——炮兵地形测绘连连长——指挥。他在左边 20 米的地方。

我向他跑过去：

“中尉同志，喂，中尉同志……”

我讲述了桥那边发现摩托车的嘎嘎声的情况。

“我也听到了，”布尔科夫说，“而且我也想过。去侦察一下吧，不过要小心！”

“是，我和沙雷金一起去。”我说。

我和谢列日没有完全爬行，但还是弯着身子前进，开始隐蔽在公路主干线旁边，然后隐蔽到桥下。就在这时，看到了一件怪事！几乎同桥平行的路沟里，半倒半倚着一辆没有熄火的崭新的摩托车，而附近没有一个人。

我应该承认，在战前不要说是摩托车，就是连自行车都没有，可是在这里，眼前就有一辆，只要推过来，就可以骑着行驶起来。

“你想试试吗？”我问谢列日说，因为怕他抢先骑着去。

“啊，什么？”他说，“还是我来帮你吧。”

我们把摩托车稍稍抬起来，把它放在水泥路面上。

我跨上坐垫，一挂油门，摩托车就飞跑起来了。

“你往哪里去？”谢列日在背后追着叫喊，可是我已经停不住了，顺着公路主干线向着前面的一座桥疾驰而去。

我感觉到，沙雷金在跟着我奔跑，叫喊着一些什么，而我既兴奋又恐惧，什么话都听不见，只是使劲握着摩托车的把手。

桥接近了。一会儿已同桥并行，一会儿就到了桥下——突然间，在前面！……我什么也不明白了。整个公路主干线已被划成像

棋盘式的形状，在每一个方块中有些不知道是装什么的箱子。

“反坦克地雷！”我思想上模模糊糊地闪了一下，这时我已经开到两只箱子之间，本能地躲到两箱之间的右边，并且……

当我清醒过来时，立即明白自己已躺在沟里，摩托车在跳过我的身子之后，撞在电线杆上，已经熄了火。只有车轮还在旋转。

“你还活着？”谢列日急忙跑过来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含糊地低声说，同时想竭力站起来。

我站起来了。

“嘿，你脑门上碰了一个疙瘩！”沙雷金说。

“起了什么疙瘩，不管它！好在……”

“是的，一切都过去了，谢天谢地！要是踩上一个地雷！”谢列日在我周围忙碌地张罗着。“我们赶快去见结实的老太太。不然，中尉就会……”

我自己明白，这样结束比什么都好。

然而，真的一切都结束了，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甚至用不着我向中尉叙述详细情况。

“乳臭未干的孩子！真叫我拿你没办法！”中尉疲惫地转过脸去。

嘿，乳臭未干的孩子就乳臭未干的孩子。中尉 23 岁，我们也已十八九岁。好赖我也是一个大人了！不过，话又得说回来，其实他确实是好样的。

我们很快地就吃了午饭。在午饭后，我有点发困了。可是德国人仍然没有出来。

到了 8 点钟，整个情况突然起了变化。

德国人开始成群地从树林里走出来了。黄昏前的薄雾笼罩着他们。但是，他们越接近公路，排成一列的队形就看得越清楚。他们没有坦克，没有装甲运输车，没有摩托车，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。

“要特别留神！”中尉迅速地说，“等待我的命令！”

我们差不多有 45 支从德国人那里缴获来的冲锋枪。我们把携带不方便的卡宾枪都已藏在汽车里。只有大首长到来时，我们才拿这种枪。按照规定，我们是不应当拿冲锋枪的，但是地方上的领导对此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当没有看见。

德国人增多了。要不就是他们没有看见我们，要不就是他们对自己过于自信。虽然，路上还不热，可是他们都没有穿大衣，走得这样神气。看起来不像是什么非正规军。

我们紧贴着公路的斜坡。我们的地势非常有利。

德国人越来越远，简直可以把他们的人数都数清楚了。至少有 200 人，走在前面的是 3 个军官。

这时，布尔科夫发出命令：

“开火！”

他自己从掩体里站起来，往前扔了两颗手榴弹。

德国人都卧倒了。不知道是全部被打死了呢，还是他们出于防御。

没有，好像没有见到有被打死的。他们爬行起来了。

我们都进行瞄准射击，虽然是可以不节约子弹的。因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子弹。

忽然间，出乎意外地沉寂。

德国人沉默了，我们也停止了射击。

时间过得非常缓慢，10 分钟过去了，15 分钟过去了，可是四周仍然一片寂静。

“现在，他们又要前进了。”中尉说，他好像摸透了敌人的意图。

真的，不一会儿，德国人忽然跳起来，他们一面射击，一面向公路这边冲过来，直接向我们射击了。看样子，他们的人数比开头少了一些，但是还是够多的。

布尔科夫一跃而起，上了公路，他大声呼喊：

“跟我来！前进！”

我们就跟着向前猛冲了。

战斗的结果，真是一个奇迹。德国人全部被歼灭了，只有我抓到了一个活的俘虏。在我们同伴中，有3人受伤，他们都用绷带包扎好了。

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我的德国人周围，没完没了地问我：

“你是怎么抓住他的？请你给我们详详细细地讲一讲。”

可是，我真没有什么可讲的。我像大家一样往前冲，我也像大家一样射击。一些德国人被打死了。我用放在防毒面具背囊里的卡宾枪刺刀刺死了一个德国人。我们自己的防毒面具像卡宾枪一样，都藏在汽车里了。后来，这个德国人出现了，他突然举起双手，喊着“完蛋了”。于是，我就从他身上摘下了冲锋枪。就是这些。

布尔科夫走过来，他也很感兴趣。

“我们给他申请授予奖章。”他答应。

然后，布尔科夫和一部分同伴留在公路边。而他把伤员，还有十来个人和我以及德国人遣送到自己的后方去。

“带着这个德国人干什么？”我问连长。

“把这个德国人押送到参谋长那里去。”布尔科夫说。

我们向自己的后方出发了。

“吃了晚饭再走吧！”不知是谁在后面追赶着我们喊了一声。

是的，很想吃点东西了。这时已经快9点钟。

我找到了参谋长魏塞洛夫少校，向他报告了这个德国人的情况。

参谋长看了俘虏一眼，说：“这个家伙！真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家伙！”

恰好在这时，我才看清楚这个德国人。真的，他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。就是连他手上的指甲也是修整了的。个子比我稍高一

点。总之，弗里茨很帅！如果换一身衣服，他会被大家认为是军官的。

“只有我，他无论什么话都不会说的。”少校说，“我不懂德语，谁来审问？萨莫欣在的话，这有多好，可是他现在不在了。”

我们的德语，都是只有说“缴枪不杀”的水平。

科斯嘉·萨莫欣是我们营里惟的一个德语讲得最好的人。可惜他在强渡奥得河时牺牲了。

“少校同志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？”我这样问道。

“把他送到副政委那里去。”魏塞洛夫打定主意，然后又随便地补了一句，“我们对他反正没有办法。”

我很早就认识副政委斯特雷尔科大尉，还是在诺全斯基附近的格鲁霍夫城读书的时候，他对我就很要好。在空暇的时间，他要我做各种各样的文字宣传工作，负责办《战斗报》。有一次，斯特雷尔科有一个想法，想把口号写在我们的汽车上。我拟了几个口号：“俄罗斯多次打败了普鲁士，俄国军队要两次攻克柏林”、“要像斯大林同志说的，不歇气地打击弗里茨”、“胜利只差一步了，鼓足干劲打到柏林去”、“胜利从艰苦的战斗中夺取，为我们的祖国前进！”、“祖国——母亲号召我们，捣毁希特勒主义的老巢”。斯特雷尔科很喜欢这些口号，命令把这些口号写在卡车车箱的两侧。正巧我们有5辆卡车。所有这些口号都用上了。有一天，他又有一个想法，要创作我们独立炮兵侦察营的营歌，斯特雷尔科要我为营歌作歌词，而且要配上某种节奏。

我创作了这样的歌词：

同志！请看看前线，
你会看到多少不幸。
燃烧着新的熊熊火焰，
敌人铁蹄下遍地血腥。

重唱：

战士，你喜欢，
来到独立炮兵侦察营？
我非常喜欢：
我的兄弟独立炮兵侦察营。

庄稼地里犁沟纵横，
可爱家园十室九空。
柳树旁孩子尸体满陈，
塘面上全是硝烟滚腾。

重唱：

战士，你喜欢，
来到独立炮兵侦察营？
我非常喜欢：
我的兄弟独立炮兵侦察营。

德国鬼子到处摆满绞索，
德国鬼子妄图斩绝杀尽。
正是现在你应该活着，
良心、智慧向你暗暗提醒。

重唱：

战士，你喜欢，
来到独立炮兵侦察营？
我非常喜欢：
我的兄弟独立炮兵侦察营。

没有找到合适的曲子，只好由自己来创作——情绪乐观的、富有朝气的、战斗的。说实在话，开始的时候，也曾经找到过一张德国歌的唱片，可是科斯嘉·萨莫欣（当时他还活着）说，这是霍斯特·魏塞尔的法西斯进行曲。

“可惜，在你的歌声中没有提到斯大林同志。”副政委指出。

“这是不合适的！”我承认。

“得啦，这没有什么！不过独立炮兵侦察营营歌的歌词写得很好。”大尉说。

歌曲唱熟了。说实在话，一个战斗紧接着一个战斗，我们很少唱。但是偶尔也唱，在战斗结束之前。

斯特雷尔科大尉见到我，很热情，他边走边说：

“我听说了！我听说了！喂，请把你的德国人带来。你的这块青伤是谁打的？是他吗？”

“是我自己碰伤的。”

我带着德国俘虏进了大尉的房间，斯特雷尔科让我们坐下。

“我们怎么办呢？”他脱口而出，“谁都不会讲德语。过去还有一位萨莫欣，可是他现在已永远离开我们了。这真是想不到的事！”

他把头轻轻地摇晃了几下，好像在动脑筋。

然后，他转向德国人：

“朋友，你一点俄语也不会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德国人说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大尉苦恼地点了点头，“从你那里能得到些什么呢！希特勒这个蠢驴没有叫你们学俄语，应该学嘛！学了，你现在就会高兴了。”

德国人一声不吭，垂下了脑袋。

“好吧，大家都睡觉去吧。”副政委说，“我们现在来安排你的德国人。”

我们走到照相排的汽车跟前，上士黎明（他还带着两名红军）也已经跑到那里，我们把弗里茨推进汽车，把汽车上了锁。

“要看好弗里茨，用你的脑袋担保。”大尉对黎明说，并把钥匙交给了他。

第二天早晨，炮兵营长特雷启雅可夫少校把我叫到他那里。

我把德国人也带去了。

一切都又是重复。

“可惜，萨莫欣死了。”营长说。

也谈到了我的青伤。

然后，少校拿出地图，把我叫到桌子跟前。他说：

“请你把俘虏押送到炮兵军团司令部去。”

“是第10炮兵军团司令部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我们上级的那个第10炮兵军团司令部。请你看看地图。这段路大约是20公里，你坚持得了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精神抖擞地说。可是我自己却仍然凝视着地图。

好极了！正好顺路到卫生营去看看瓦丽。我们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面了。虽然流传着各种传说，有一个什么上尉经常到她那里去，让他见鬼去吧。真的，到了那里，把这个德国人安置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对，随便放到什么地方都可以。

我和瓦丽曾经有过一段浪漫史，那是在很久以前——在莫斯科，在1941年。

我认识她，是在斯雷登克配给商店里排队的时候，那里凭食品供应证供给食物。那是9月19日。后来，我们经常去那里。10月份，瓦丽到前线当了护士。过了两个星期，我也上了前线。从斯大林格勒起，我们几乎没有离开过。她的卫生营不论在什么地方，总是同我们的部队毗邻，我不止一次地在晚上请假到瓦丽那里去。在1月份，我突然患了恶性疟疾（在前线，冬天流行恶性疟疾），噗冬一下倒在瓦丽的卫生营——在那里一直躺了一个半月。两个星期以前才刚刚出院。在那一个半月里，我同她真是亲热到了极顶。

“是的，你们不要忘了带点吃的东西。”少校说。他吩咐自己的传令兵：“沃洛嘉，你要安排好！”

按照规定，少校是没有传令兵的。沃洛嘉被免去了各种工

作，他在我炮兵连当文书——军需中士（设这个职位也是没有必要的）、独立炮兵侦察营的共青团小组长、收发员（邮递员）、特雷启雅可夫和斯特雷尔科的传令兵，甚至还是储藏室保管员，因为过去的保管员有盗窃行为，被送到惩戒营去了。

由于沃洛嘉的帮忙，我领到了两个烤面包、两个美国焖肉罐头、三包豌豆制的干缩食品，还有食盐和马合烟。这就是全部吃的东西！

“现在，弗里茨，我和你饿不死了。”我一边对着德国人说，一边把食品装进背囊。

“我不是弗里茨，叫汉斯，汉斯。”德国人似乎懂得我的意思。

“得啦，汉斯就汉斯。”我同意了，“我们走吧！”

我们从炮兵营驻地出来，按照地图上标着的方向，沿着公路出发了。德国人走在前面，不知为什么，一个思想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，应当找一些绳子，把他的手捆起来。唉，可是我忘记了。但是，再转回去找绳子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，甚至这还是一种不祥之兆。

我没有手表，大多数红军一样都没有手表。我想起了沃洛嘉的主意：

“要把他的手表摘下来！”

我们已经走了5公里，我叫汉斯站住，从他的手上把手表摘下来。我看了看，似乎还不错，不是老式的。

汉斯很随便地把手表给了我，甚至还帮我把手表戴在我的手上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说，这是我想起的在学校里学过的一句德语。

德国人没有做声。而我则在咒骂自己，为什么在学校里对待德语课那样不认真。我只记得一首荒谬可笑的德国歌曲，可是它现在什么用处也没有。如果我那时能够多学一些德语，就可以问：你是谁，干什么的，哪里出生的，家庭情况怎样。

我还记得“孩子”这个单词，于是我就问他：